



我在耶路撒冷学希伯来语

■ 景嘉伊

在我还没有下定决心提交项目申请前，身边的好朋友基本都得知了这一消息。

“听胡老师说你要去以色列学希伯来语了，加油加油！”

“没有没有，我努力不丢脸……”

我慌张地低下了头，说话少见得磕磕绊绊。究其原因，还是对于未知目的地的恐惧，以及对涉足陌生领域的不自信。

紧接着的问题基本是：“你为什么去（来）以色列？”不论是进入海关时的正式问询，还是同学间自我介绍的相互发问，抑或是在街边与当地陌生人闲聊的寒暄开场，如果排列此行中听到最多的问题，我想这句话一

定居于榜首。看似简单的发问，隐藏于背后的其实是不同群体对该地的复杂价值判断与取向。

对于我来说，硕士阶段所从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有意无意中将很大比重分给了看似冷僻的伊斯兰世界。去年11月，在以色列访问的导师发来看到的希伯来语项目招生信息，鼓励我到与伊斯兰国家长期纠葛的“对岸”看看，从学习语言入手，换种思路再对同一问题进行解读。但末了加上一句：“不过据说希伯来语较难。”

作为一名长期与刻板印象进行斗争的入门级文化研究者，我还是不可落俗、但言辞恳切地问出了“安全吗？”“边境

冲突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身一人前去，心境就与以往大有不同。出发前在家里唉声叹气发愁了三天，但终于在必须要离开的那个闷热的北京夜晚顿悟到，没有人能替代你去寻得答案。恰逢博士开学前夕，既然在未来的工作学习上都选择了勇敢与舒适圈作别，那不妨就以当下为起点，在新领域中重新检验自己的适应度与受挫力，也足以为人生一大乐事。

何以染金光

驱车初入耶路撒冷，我还是被这巨大的反差景象震惊了：错落起伏的群山间夹杂排列着低矮房屋，不加渲染的土灰色

墙面与荒凉自然幕布融为一体，说是在岩石之上拔地而起仿佛也不及此壮观。不知是历史在这里沉淀褪了色，还是它从未绚烂高调过。

当行李箱在东颠西倒中摔下五次后，我终于跟着狂奔不羁的公交车来到了此行目的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犹太典籍《塔木德》中曾骄傲地宣称：“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8月中东酷暑大地的正午分外难熬，若仅面对这一幅人之目力所及的景致画卷，不免对这夸耀产生怀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身体的沉浸，深入走进便会发现，那歌里传唱的闪烁着希望的金色，从过去到未来都不体现于物料上。

自公元70年被古罗马人逐出犹地亚，两千年来，散落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始终祈祷再回锡安。重回仅在古老历史观念中出现过的故土，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激情这类振奋一时的精神信念，更多的还是基于现实的全盘考量与切实执行。第一步便是合法性的确立问题，即我们是谁，何以在此宣告主权。

早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就有提案倡议通过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标志性



本文作者在耶路撒冷

大学，发挥教育在当代犹太文化复兴中的关键作用。初创于1918年的希伯来大学就诞生于该背景下。目前，学校共发展出六个校区，我所在的Scopus主校区以人文社科领域为主。校园门外的纪念壁上，仍清晰镌刻着这段于荒山之上起学术高楼的艰难岁月，以及呼号奔走其间的犹太裔奠基者们，包括为世人所熟知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以及被称为“以色列之父”的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

档案馆里记录下的爱因斯坦往事，可清楚解释在他处生活优渥的犹太先驱们为何甘于

倾注热忱投身到这份艰苦而漫长事业中：“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任何其他公共事务能像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提议那样令我欢喜……现在到了我们为自己寻找精神家园的时候，在严酷的政治现实和处处环绕的物质主义氛围中，我们仍可在这里看到人类高尚理想的耀眼光芒。”

当然，后来者也没有辜负这份前人力争来的果实，作为以色列的最高学府，官网上罗列的数字就能简单快速地“炫耀”出一份令人信服的成绩单：截至2012年，希伯来大学共诞生了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他囊括的知名奖项还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以及图灵奖等。历史上曾有四位以色列总理就



希伯来大学杰出校友荣誉墙

读于此。在该国设立的最高荣誉奖、用以表彰对社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以色列奖 (Israel Prize) 得主中，希伯来大学校友高达 40% 以上。

也许是民族记忆过于残酷，需要的建设者品质分外集中，这里的教育理念始终是务实求变的。比如多数学生在步入大学前必须义务入伍，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真刀实枪”地进行历练。希伯来语词汇 “היפות” 也一直被特定地用来描述犹太人一项突出的民族品质，即不惧权威、批判善辩的探真精神。教学楼里贴着的标语也时刻提示着：“我们的使命是投资培养有信念、有能力、有热情改变世界的人。”我曾在这句话下突然呆滞地思考许久，小心地算着自己究竟能达标多少。

如今，漫步在校园内，很难发现对于那些过往辉煌的高

调宣传。唯有爱因斯坦骑着自行车做鬼脸的人形牌多处可见，跨越山海，载着他的民族情怀与科学精神，开心穿梭在独属家园的蜿蜒小径上。也许这就是教育者们想向学生传递的基本育人理念：以科学改变世界，为人类谋求和平。毕竟，前辈们曾秉持着这样的信念，筚路蓝缕地将民族梦想初步实现，并满怀憧憬地交付到下一代手中，以此生生不息。

做一名懂得努力的“差生”

现代希伯来语由 22 个字母和 5 个词尾变体组成，分印刷体和书写体两种区别，其拼写方法为横写从右至左。这个最早被用来书写基督教和犹太教神圣典籍的宗教语言，是流散后的古犹太民族自我身份界定的重要标识。然而，希伯来语不是导师口中的“据说”比较难，

而是“确实”比较难。这一方面与其有限的使用人数和狭小的使用地域相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其长期中断后的近代突然复兴有关。

开学第一课，云里雾里基本没听懂，翻开当时的笔记，那种边叹气边七扭八扭模仿着画字符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第一次考试，百分制成绩只有 28 分，还是在熬夜认真复习课堂内容之后；隔壁室友完成每日作业只需要半小时，而我绞尽脑汁三小时都写不完……“我是不是智商意义上的比较笨？”起初，脑海中经常性地跳出这个问题，一度严重挑战了我的自信心。别无他法，那就勤能补拙吧。

根据入学前的等级测试结果，我被分在了 Aleph 班。Aleph 是希伯来语首字母 א 的发音，此处意为初级班。在课堂上，应是有意为之，一无所知的学

习者被直接安放在了纯希伯来语的交流环境中。从步入教室的第一刻开始，除去布置作业能听到英文的再次解释，我几乎再未与老师进行过英语对话，就算我满脸都写着大大的问号。更为可贵的是，活力满满的教师能调动起全身机能，使用丰富的肢体动作、创造实用的模拟情境、设计多样的互动环节、借助各异的表现形式来帮助学生猜测词意并理解用法。于是，我们经常不在固定的室内座位上，也不机械面对呆板的教科书，而是站着、跑着、游戏着、说着、唱着，去共同走近彼此都陌生的他国语言。

在以色列，工作日从每周日延续至周四。在每一个阳光还未来得及炙烤的清晨，我准时

7:50 从宿舍出发，翻越两座小山头后气喘吁吁地坐进教室，开始进行从 8:30 至 13:30 的密集学习。下课后用约两小时完成习题，再进行两小时的自主记忆与复习，次日以随堂测验形式验收前日知识掌握情况。这种集中式的语言授课方法被称为 Ulpan，日复一日贯穿全程。我们使用的教材系希伯来大学自主研发，红册为讲授集，蓝册为词汇与习题集，装帧设计上可自由撕扯，方便教师每日进行作业收集与批改。

虽然还是在经常埋怨自己笨，或是可以将努力程度再量化高一级，但离开前的最后一场考试，我取得了 87 分的成绩。从 28 分到 87 分，当我把这个进展告诉导师时，他开心地说：“这才是你。”



努力跟上节奏的每日学习

“Cool Guy Will Never Die！”

很大程度上，以色列是依靠来自全世界犹太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时至今日，这种传统仍体现在课堂人员构成上，但取向更为丰富。此次暑期项目共设置 8 个初级平行班，每班约 20 人。项目中近 1/3 的人来自美国，约一半来自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这既与当前犹太人地域分布的既成事实相一致，也与耶路撒冷作为宗教文化中心所独具的吸引力相契合。

以我所在的班级为例，地标分别定在了中国、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美国和哥伦比亚 7 国。而同住一间公寓的室友来源更为集中，均属于传统认知里的“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瑞典、瑞士、德国和美国。分外巧合的，她们都是博士在读，怀揣着一颗学术治世的心。于是，日常互动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不仅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空间跨越，还有宗教意义上的文化区隔，多元而有趣。

我知道多数情况下，仅用“酷”来定义一个人是随意而肤浅的，但我依然没有想到更为合适的形容词来描述此次希伯来语学习的同学们。求学者中，下有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上有白发苍苍的老者，却都在



形式多样的互动教学课堂

未知的语言前抹平了年龄或任何其他生理差别；他们有人与这片土地并无信仰联结，却臣服于人类未尽的好奇驱使与知识学习，长期从事古希伯来语、古代近东考古、伊斯兰与中东等各自宏大的学术研究；他们有人本可对他者历史遭遇并无同理心，却自我建构起可对话的情感共鸣体验，在故纸堆里收集起大屠杀历史中平庸的恶、平庸的善。

多年后，也许我终将会遗忘希伯来语“你好”“再见”“谢谢”究竟怎么说才地道，但我会依稀记得那些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向我传递过的精神独立与思

想兼容的境界上的酷，找寻自我与追求所爱的行为上的酷，探索未知与超越舒适的勇气上的酷。

“Cool guy will never die!”趴在窗边和想回瑞典做难民研究的室友一起写作业时，她满眼放光地对我说。

谁的应许之地

耶路撒冷是令人沉思的城市。作为一个神的殿堂、两个民族的首都、三大宗教的圣地，在这里，更多是无法仅凭努力就能达成的完美结局。政治需求、民族重生与宗教竞争共同依附，使这座城市承受了太多崇高与悲痛。和平从来不是这里的主

色调，能够享有片刻校园生活的欢愉，在我看来可谓之侥幸。

截至2019年8月，以色列共有人口902万，其中犹太人以74.5%的比例占据主体，其余以阿拉伯人为主。尽管都是盖章认定的以色列公民，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甚至文化认同在这里从来不能轻易划等号。第一个安息日到来前，我曾询问当地阿拉伯同学公交运行的起止时间。她腼腆地笑笑道：“我只坐过自己的公交，依旧正常运行，犹太人的你需要问别人。”担心我不能理解，她还补充说，耶路撒冷为两个民族单独设计

了公交系统。

据有限观察，不仅在交通方式的选择上，甚至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维度里，双方也基本在隐形边界内各自生活。考虑到对国家社会治理抱有不同理念，对民族荣誉和历史记忆秉持不同立场，以及其他涉及生存而无法达成一致的诸多障碍，双方确实有这样做的充分理由。

犹太人的坚持来自无处可去后对故土的珍视。在这个叙事体系里，以色列的成立“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民族一千多年来坚持梦想的故事，是一个在深渊边缘徘徊的民族最终实现救赎的故事，是一个国家创造奇迹、开创未来的故事”。阿拉伯人的坚持则来自遗失家园的痛苦与不满。在这套叙述逻辑里，“来自全世界的犹太人返回他们上帝的应许之地建立自己的国家，迫使数十万的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从此，每年的5月15日，也就是以色列独立纪念日的第二天，就成了巴勒斯坦人集体记忆中的‘浩劫日’……西方主流媒体让人看见自杀炸弹客的强烈攻击，却掩盖以色列压迫并驱赶巴勒斯坦人的事实。”

非常明显的，两方都是受害者的自我认知与定位。假期

中，我曾与两位同学一起，在不安分的好奇心驱使下，紧张兮兮搭坐阿拉伯公交车，穿过著名的300号边防检查站，来到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这座《圣经》中记载的耶稣诞生地。目前，这座城市的进出口由以色列控制，内部日常行政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负责。

我也自诩曾看到过世界诸多荒凉景象，但面对这幅场景仍不免揪心。2002年起，以色列政府沿六日战争前以巴边境开始修建高8米、长约700公里的“安全隔离墙”，官方说法是防止巴激进组织势力渗透。一墙之隔，两面天地。墙的一面，以色列正为进一步优化民生、跻身科技强国而奋斗；墙的另一面，污水横流，房屋失修，最知名的咖啡厅是不足5平米的星巴克仿冒店，出租车司机为了多赚折合人民币5元的小费低声下气，艺术家绘制的街头涂鸦格外刺眼——Make Hummus, Not Walls。

到底什么才是最优解？好像没有明确答案，或是因民族立场而异没有共识，或是因政治复杂而没有结论。所以最后的最后，我只能诉诸于朴素而美好的情感，希望和平常驻，幸福常在。

我曾在神圣地标建筑大卫塔附近参加万人规模的露天音

乐会，每首毫无主题关联性的流行歌中，大家都兴奋地穿插着高呼“耶路撒冷”四字，人声鼎沸。好希望栖居在这里的神也能听到，并如传说所言，永久守护其土其民。

我曾在宿舍窗边每日眺望耶路撒冷城市全景，从晨光熹微到燃亮万家灯火，不远处的隔离墙、圆顶清真寺、六日战争阵亡将士纪念公墓都一一看得清楚，宣礼塔传来的礼拜声也按时入耳。真是混搭啊，却在随机排列中碰撞出有序的感动。

我也曾在最后一堂课学会最后一个希伯来语单词——“欢迎”，并在教师引导下聆听7个国家的伙伴用本国语言说与他人。希望有一天，欢迎你能毫不畏惧地与每个异文化环境相处，欢迎你能毫无顾虑地在平等氛围中拥抱自我梦想，欢迎你能清楚记起虽有分歧但我们始终是共存于此的人类同胞。

我始终相信，人类的情感共鸣是迈向彼此的第一步。愿交流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愿“欢迎”的声音传遍耶路撒冷的每个角落。

愿耶路撒冷一切都好。✿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于2019年暑期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进行短期学习。图片来自作者。)